

主编 张长法

治策通览

中州古籍出版社

治策通览

主 编 张长法

副主编 贾传棠 任子厚 翟相君

编 委 (姓氏笔画为序)

吕鸿儒 任子厚 刘苏宁

朱海凤 杨松璋 张长法

贾传棠 董光峰 翟相君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治国理论、策略、方法的专著，内容厘分为《修身》、《勤政》、《任贤》、《纳谏》、《通变》五卷。每卷所选材料均按时代的先后以及作者的生卒年月或主要活动时间依次排列，不偏门户，不拘一格，纵横结合，以类相从，上起周、秦，下至明、清，内容完备，查找方便，而且每则正文的后面都附有注释、译文、说明各项，各级各个知识层次的党、政干部均可阅读。

治 策 通 览

张长法 贾传棠 任子厚等编著

责 任 编 辑：范 炯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所发行 河南 中牟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38.5印张 90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ISBN 7-5348-0180-x/k·34 定价：18.70元

前 言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她最早进入封建社会。她有举世闻名的发达的农业和精湛的手工业，有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的创造发明，曾经在许多领域登上过科学的顶峰。这些成就至今仍被世界各国广泛称颂，我们自己也引以为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生产技术是科学，领导活动也是科学。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治理这么大的国家，而且总是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头，其中总会有一些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历史规律的政策和策略。如果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到来，一定的物质、精神条件的形成，如果没有一批明君、贤相、仁人志士对国家的尽心治理，这些条件决不会凭空产生。所以，在讴歌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的同时，对我国古代的领导科学，尤其是治国方面的经验也应该给以肯定和总结，并且努力探索其内在的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到相应水平的产物。这是客观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出现是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感情或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对它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扬弃它的专制制度、腐败的官僚政治、落后的生产方式及其个人崇拜和君权至上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对它的一些积极的东

西，即历代的明君、贤相、仁人志士在治国方面的好的想法、做法是应该借鉴的。如在承认君主神圣的前提下要求当权者止欲去私；在承认特权等级制度的前提下要求赏罚严明；在承认君权至上的前提下要求广开言路；在承认世袭制度的前提下要求选贤任能；在承认因循旧制的前提下要求因时通变等。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政策和策略，不仅对一个朝代政权的巩固、而且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对发展经济、创造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等，都是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的。它们是我国古代领导科学中宝贵的理论财富，至今，仍然在各种历史文化典籍中放射着特有的光彩。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采取象泼脏水时连同孩子一起泼掉的做法是不应该的。

我国古代治国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保民”、“爱民”。从《尚书》、《论语》、《孟子》，直到清代黄宗羲的《原君》，都贯穿着这种思想。《论语·学而》说：“节用而爱人。”《孟子·尽心章句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梁惠王章句上》说：“保民而王”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他们把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当做区别贤君和暴君的重要标准。黄宗羲的政论集《明夷待访录》中《原君》一文把这种思想阐述得特别清楚。他在歌颂了舍私济公的古之贤君之后，指出了“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他们“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作者大声疾呼“为天下”，是贤君，“为自己”，是暴君。并大胆指斥“暴君”为“寇仇”、“独夫”、“天下之大害”，正面阐明“为天下人兴利”才是君主的职分。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对于“保民”“爱民”的论述很多。《荀子·王制》中关于“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吕氏春秋·顺民》中关于“顺民心，功名成”，刘向《说苑·政理》中关于“治国之道，爱民而已”等论述，都是这一治国理论的典型例证。

根据“保民”“爱民”这一治国的根本原则，古代思想家、理论家提出了“修身”的主张。治国不能为己，当权者当然需要有“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高贵品质。没有这种品质就做不得贤明的君主，就会成为“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大害者”。

“修身”的内容很多。核心的问题是“去私”。“私不能去”则“公不能立”，“公不能立”，则“不能行大义”，“不能行大义”则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满足个人的淫乐。满足个人的淫乐，就会导致国家的灭亡。所以私能不能去，是一个人修身成败的关键。因此《商君书》说“公私之交”是个人和国家的“存亡之本”。

根据“保民”、“爱民”这一治国的根本原则，古代的思想家、理论家又提出了一种“勤政”的主张。这里所说的“勤政”，实际上就是指努力从事治理国家的事业。而治理好国家的目的是安抚百姓，也就是说能让亿兆人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并求得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说的“唯劝农业，无夺农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讲的就是这种道理。

治国的事业是非常艰巨的事业，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首先是解决天下百姓的物质生活，即吃、穿、住的问题。这正如《孟子·尽心上》中所说的“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贞观政要·君道》中所说的“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怎样去解决百姓的物质生活问题呢？孟子的主张是“制民之产”，其多寡的标准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换句话说即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要做到这一点，当权者必须在发展生产、开辟土地，兴修水利的同时，厉行节约，减轻赋税。《老子·第七十五章》明确指出“民之

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历代的明君、贤相、仁人志士对这个问题都很重视。如根据《宋史》的记载，宋祁曾经上疏宋仁宗揭露三冗、三费的严重危害，并且提出了裁减机构、节省开支的建议。据《贞观政要·俭约》的记载，唐太宗曾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治国勤政的内容是很多的，除上面谈到的为解决百姓的吃、穿、住的物质生活问题而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之外，还有一个教育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历代的有识之士都很重视。如元代的不忽木在至元十三年给忽必烈的上疏中专门论述了兴办学校的重要性。他说：“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盖自尧、舜、禹、汤、文、武之世，莫不有学，故其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为后世所法。”

同教育问题相比，几乎同等重要的还有一个同自身的腐败现象做斗争的问题。人类社会错综复杂，国家、地区、民族、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无日不在发生。在当权阶层内部，那些廉洁奉公、体恤人民的明君、贤相、仁人志士同盘剥百姓、营私舞弊的暴君、贪官污吏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宋史·列传第二十五》记载王化基给宋太宗赵光义所上《澄清略》一疏中所说的是何等恳切！他说：“贪吏之于民，其损害甚大，屈法烦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于木之受蠹。”对于当权阶层内部产生的这种腐败现象，能否采取严厉的措施，加以限制或消除是决定一个政权能否存在，或存在时间长短的关键所在。

根据“保民”、“爱民”这一治国的根本原则，古代的思想家、理论家还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任贤”问题。韩婴《韩诗外传·卷七》中说的“无长安之国，恒治之民，得贤者昌，失贤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把任贤的重要性提到了应有

的高度。另外，鉴于历史上的任贤之难，人才屡遭压抑，政权屡遭倾覆的事实，各代都有一些明君、贤相、仁人志士去探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规律，并且提出过不少解决的方法和措施。他们不断告诫当权者不要根据个人的喜怒以及和自己关系的远近去决定对人才的取舍，必须消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主义思想，必须克服嫉贤妒能的个人主义心理。《贞观政要·任贤》篇赞扬了李世民于仇虏之中选拔魏征的宽阔胸怀，《资治通鉴·唐纪》表彰了李世民不私故人，斥退庞参的举动，这些都是值得后世深刻反思并身体力行的。其它如金代曹望之提出建立推荐人才的具体制度的设想，金世宗建议对人才要破格提拔的意见都是很有见地的主张。

根据“保民”、“爱民”这一基本的治国原则，古代的思想家、理论家反复地提出过当权者，尤其是最高当权者必须“纳谏”的思想。这里所说的“纳谏”，即是广泛地听取关于治理国家的不同意见和建议的意思。这是由于当权者个人闻见和知识的局限性同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白居易在《为人上宰相书》中论述得很深刻。他认为“朝无敢言之士”“廷无执咎之臣”，那么“上之得失，下之利病，虽欲匡救，何由知之？”所以，他才谆谆告诫当权的人们：“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后明”“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后聪”。《元史·列传第二十三》记载元英宗同拜住谈话时说：“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虑所及，汝为朕股肱，毋忘规谏，以辅朕之不逮。”拜住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说：“昔尧舜为君，每事询众，善则舍己从人，万世称圣。桀纣为君，拒谏自贤，悦人从己，好近小人，国灭而身不保，民到于今称为无道之主。”这里，英宗君臣把“纳谏”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充分而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是说，能不能正确对待“纳谏”问题，不仅决定着个人下场的好坏，而且决定着所治理的国家和地区的前途和命运。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有关“纳谏”的记载是很多的。这些故事除了说明“纳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有关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外，对于进谏的方式也很重视。鉴于进谏对象（即受谏者）的思想品质、脾气性格、环境气氛的不同，进谏的方式也应该灵活多变。概括地说有两种。一是直言其事，二是连类取比。《国语·周语》中邵公谏厉王弭谤的故事属于第一种。

《战国策·齐一》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属于第二种。不管使用哪种方式，都应注意对方的接受能力，以达到说服别人的目的。

根据“保民”、“爱民”这一治国的基本原则，古代的思想家、理论家还不断提出过当权者尤其是最高的当权者必须“通变”的主张。古代所说的“通变”，即指当权者、决策人应该根据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政策和策略一旦脱离了实际，就会导致事业的失败。

《吕氏春秋·察今》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

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那么政策和策略的变化、发展也应该是绝对的。所以，改革是合乎规律的事情。但是也应该看到，客观事物也有相对的静止阶段，因而，当权者，尤其是最高的当权者也应该注意政策和策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没有政策和策略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就很难有什么合乎规律的卓有成效的改革。《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李世民的话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

做到“通变”，不断调整政策、法令，离开一定的条件是不行的。首先，它需要调查研究，它需要当权者、决策人对现实情况及时地把握和准确地理解。苏辙在《栳城应诏集·卷六》中说：“臣闻善治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情，而后得御天下之术。”

这里所说的“情”，其实就是指不断变化着的客观情况；这里所说的“术”，实际上就是指正确的政策、策略和方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就可以避免决策的失误，把天下运乎掌上，达到“仁者使效其仁”，“智者使效其智”，“勇者使效其勇”，“力者使效其力”的目的。

同别的国家比，我国封建社会所延续的时间特别长。在这种制度下，中国人民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无论是社会制度、治国方式、领导方法或意识形态的发展都有独特的个性和自己的历史。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的当权者的领导活动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性活动，所以，有关它的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以上所谈五大内容，本书所选者，不过是其沧海一粟，它只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治国经验的一般性规律和原则的概括和总结，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不是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就会承认它的存在和价值。当然，它们常常是瑕瑜互见，糟粕和精华杂揉在一起的。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加以开掘、整理，才能使它们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领导科学体制和决策体制，顺利实现领导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本书分六个部分。先秦部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贾传棠同志执笔；两汉部分由郑州大学中文系翟相君同志执笔；魏晋南北朝部分由郑州大学哲学系吕鸿儒、党委办公室朱海风同志执笔；隋唐五代部分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任子厚、《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杨松璋同志执笔；宋辽金元部分及各卷提示以及前言、编例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张长法同志执笔；明清部分由河南省纪检委董光峰、《城乡信息报》编辑部刘苏宁同志执笔。最后由张长法同志统读全稿，对该书的体例和文字做了些必要的修改和校订。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得到过许多同志的帮助，尤其是北京出版社的王兰锁先生，他不仅审阅了该书的部分稿件，而且

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在这里，我们特致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编纂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我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工作是努力的。但由于理论、知识水平所限，错误和疏陋之处在所难免，热切期待着专家、学者、各级干部以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张长法

1987年9月25日

于郑州花园路54号楼

编 例

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以及古为今用的原则，本书所选以治国方面的理论、策略、方法为限，不偏门户，不拘一格，只要是对今日中国有借鉴作用的，不论是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兵家、农家；也不论是孔丘、李耳、司马光、王安石，我们都加以收录，决不因人废言。

二、根据问题的性质，本书厘分为五卷。卷一为修身篇；卷二为勤政篇；卷三为任贤篇；卷四为纳谏篇；卷五为通变篇。每卷前面都有简短的提示，对该卷的内容作概括的介绍。每卷所选的材料主题基本相同，然后按朝代的先后顺序以及作者的生卒年月或主要的活动时间依次排列，上起周、秦，下至明、清。纵横结合，以类相从。尽量给读者使用或查找时提供方便。

三、每则正文的后面都附有注释，目的是为了照顾不同层次的读者，帮助他们正确理解正文所阐述的理论内容。注文有的注事，有的释义，有的事、义兼释，繁简详略视具体情况而定。注文注意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差别，力求通俗易懂、正确无误。如遇有歧义，一般都以一说为主，为了避免繁冗，不列举诸说以作辨证。另外，前面出现过的，一般的不作重注。但是由于本书是集体编写，又鉴于读者一般不可能通读全书，或者由于选文本身前后取义不同，所以重见之处恐难以完全避免。

四、为了让古文阅读能力较差的读者省时省力地使用本书，每则正文之后都附有译文。一般采用直译，力求准确地表达出原文的内容和语气。有时因原文过于简略，或古今汉语语法的差

异，诸如跳跃性较大的过度，主语、宾语的远距离省略等，直译时语气不连贯或不易看懂，也酌采了意译的方法，在原文字义外加上一些词语作为补充。

五、为了进一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配合注释、译文，本书在每则正文的后面都附有简要的说明。这些说明性的文字，主要是为了理清原文的逻辑线索，阐释它的主要论点，指出它的使用价值和借鉴意义，或者对原文的出处、背景、作者状况加以介绍和补充，帮助或启发读者深入地思考问题。

说明力求简明扼要，尽可能地避免主观臆断，努力做到符合原文的实际。方式、方法不拘一格，篇幅长短因文而异。

目 录

前言	(1)
编例	(1)
第一卷 修身篇	(1)
君子自度治民而勿贪安逸	(3)
人贵有自知之明	(6)
祸莫大于轻敌	(9)
受国之诟是谓社稷主	(9)
医病与知政	(10)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11)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2)
三人行必有我师	(12)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13)
有教无类	(13)
过而不改是谓过	(14)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14)
说之不以道不说也	(15)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16)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17)
匹夫之志不可夺	(17)
后生可畏	(18)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18)

临大节而不可夺·····	(19)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20)
其身正不令而行·····	(20)
“一言兴邦”与“一言丧邦”·····	(21)
政者正也·····	(22)
舍生而取义·····	(23)
见义而勇为·····	(24)
禹闻善言则拜·····	(25)
富贵不能淫·····	(2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27)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28)
公私之交存亡之本·····	(29)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	(30)
公生明偏生暗·····	(31)
蔽于一曲暗于大理·····	(32)
去私欲秉公道·····	(32)
祸生自纤纤也·····	(33)
相形不如择术·····	(34)
立君为民·····	(34)
使法择人使法量功·····	(35)
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	(36)
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	(36)
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	(38)
一手独拍虽疾无声·····	(39)
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	(40)
治天下必先公·····	(41)
君之所以立出乎众·····	(43)
人有三死而非命·····	(44)

孔子观欹器.....	(45)
秦穆公丧马.....	(47)
秦二世爱听谎言.....	(48)
张良圯上遇老人.....	(50)
燕相出亡无人随.....	(53)
孙叔敖埋两头蛇.....	(54)
郑相嗜鱼不受鱼.....	(56)
身教重于言教.....	(56)
弥子瑕得罪于君.....	(58)
君明则臣忠.....	(60)
君子慎择友.....	(61)
污辱难洗刷.....	(62)
人君刚则国家灭.....	(63)
老子问师.....	(64)
宁越苦读.....	(66)
晋平公七十欲学.....	(67)
学习可增长才智.....	(68)
学问可以扬名.....	(69)
明主有三惧.....	(70)
楚庄王忧无师.....	(73)
禹见罪人而泣.....	(74)
尧存心于天下.....	(76)
周成王告诫伯禽.....	(78)
尹文论治国.....	(79)
师旷论治国.....	(81)
受人赐者畏人.....	(82)
知识重于财富.....	(83)
不博览犹谓闭暗.....	(86)

学问有深浅	(87)
博览增见识	(89)
圣人需要学习	(90)
孔子不耻下问	(92)
帝王圣贤皆求师	(94)
学习使人聪明	(96)
不学不成器	(97)
积德可以存国	(99)
霍光辅政	(102)
马援诫侄书	(103)
不擅大惠畴答众劳	(106)
能小复能大	(107)
修身养德明志致远	(108)
志当存高远	(109)
宜同荣辱	(111)
良将之动犹璧之不污	(112)
恭为德首慎为行基	(112)
以清白遗子孙	(114)
郗超不以爱憎匿善	(115)
不避豪强	(116)
曹操割发自刑	(118)
夏侯惇率诸将士劝种稻	(119)
孙权劝学	(120)
周瑜折节容下	(122)
引咎责己自贬三等	(123)
但有远志不在当归	(125)
临危局而自若	(126)
好恶在道雅量待 下	(128)